

文韵丛书

和谐与辉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季福田 主编



和谐与辉煌

季福田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谐与辉煌/季福田主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11
(文韵丛书)

ISBN 978-7-104-02857-4

I. 和… II. 季…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文集 IV. D6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7142 号

和谐与辉煌

策 划:吴淑苓

责任编辑:吴淑苓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百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20

字 数:180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2857-4

定 价:280.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古代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

杨绪银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传统和谐文化对于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构筑和谐的民族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价值引导作用。今天,弘扬传统和谐文化的思想精华,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十分突出的价值和意义,这主要表现在:

一、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支撑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七大更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愿望,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也提出了许多关于和谐社会的社会理想,并激励着人们一直为这个社会理想的实现而不断努力。今天,我国已经进入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一个社会矛盾凸显时期,这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尤其要有和谐的市场经济环境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可以从传统和谐文化中找到和谐思想的源泉,传统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渊源。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对传统和谐文化的理论践行,传统和谐思想的超越与创新。

儒家、道家所设计的大同社会理想:

1. 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这个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包括权力公有和财物公有,而首先是权力的公有。权力公有的口号是“天下为公”,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管理社会的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

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其所以要明确权力公有，是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只有取消权力的个人垄断，才能保证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受垄断；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证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王权的。《礼记正义》解释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正义》是以大同为五章故事的，所以举出尧不以帝位传其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其商均而传禹的事例以资证明。《正义》虽然也承认“天下为公”首先是指最高统治的帝位，但从所举事例看，不全是《礼运》所说的大同，因为尧、舜虽然没有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但在思想上是把“天下”作为私有物来“禅让”的，而且又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让人的。《史记·五帝本纪》写道：“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舜与“大同”的区别在于：尧、舜的禅让是权宜性的，大同的选贤与能是制度化的；尧、舜是个人指定的，大同是“天下”选举的；尧、舜是终身制的，大同是非终身的。在大同世界里，就根本不存在帝与王。

唐人孔颖达作《礼记正义》多收集前人的观点，而主要又是汉人郑康成的观点。如果说汉人还有敢于说不私传子孙为公的勇气，那么到了唐代就只有歌颂私传子孙为公的本领了。最负盛名的柳宗元《封建论》歌颂秦始皇的废封建行郡县说：“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属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秦始皇以天下为一人一家之天下，自称始皇，要千世万世而为君，私之至极，何公之有？连能秦始皇也能称公，这世上还存在私么？所谓“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难道不是对秦始皇的公开吹捧和对公天下的有意亵渎吗？当然，柳宗元赞许秦始皇的也只是行郡县，而且肯定他的出发点是私，用后来王船山的话说是“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因此许多事情是“即其罪也以为功。”其实所谓

“废封建,行郡县”仅仅是将“天下”由众多子孙共同统治,还是由其中某个子孙一人统治分歧问题,最多也是在一人统治的前提下分点余羹给统治阶级的其他人员问题,比起大同世界的公,相去已经不只十万八千里了。

2. 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这个体制是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地方更是地方人的地方。地方事务由地方民众选举贤能之士负责管理。这里的选举指的是民举,而不是官举,官举与民举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后儒却混淆了两者的界线,甚至有意改民举为官举。著名的东汉经学家郑玄解释为:“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故“天下为公”实际是指禅让君主领导权而言。对于这一点,著名的唐朝经学家孔颖达说得更明确:“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选贤与能者,向明不私传天位,此明不世诸侯也。国不传世,唯选贤与能也。”汉儒虽然也以“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分别指中央和地方政权,但用的仍是尧、舜的典故。尧、舜一方面禅让帝位,一方面选贤与能,好事做尽,而民众却未与闻,因而其并不是大同世界本来意义上的选举。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的性质一再改变,递至隋唐,竟成了专指朝廷对士人的选拔,自《唐书》直至《明史》,均辟有《选举志》,记载历代的科举情况,选举与民众便彻底绝缘了。

3. 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信与睦是良好人际关系的核心,而“天下为公”才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天下为公”,人人是社会的一员,社会有每人的一份,衣食有着,地位平等,无胁迫的可能,无依附的必要,是大同世界人际关系总的概括。这个以“天下为公”为前提的人际关系同样遭到了后儒的篡改。《礼记正义》解释说:“讲信修睦者,讲,谈说也;信,不欺也;修,习;睦,亲也。此淳无欺,谈说辄有信也。故哀公问周丰云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也。”通过《正义》的解释,“讲信修睦”仅是一种言说交往的表面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又是王化影响的结果,大同世界的本质被阉割了。

4. 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大同世界描绘的社会是人人敬老,人人

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在这里,人们视他人父母如自己父母,视他人子女如自己子女。《礼记·礼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男有室,女有家,社会和谐,人民安居。对这段最具实际意义的社会保障,后儒也是多有窜改的,如将社会保障制度解释为一种在君王影响下的社会风气。所谓“君既无私、言信、行睦,故人法之,而不独亲己亲,子己子。”将人人有劳动权力的“壮有所用”解释为“不爱其力以奉幼”,将男有分解释为“无才者耕,有能者仕,各当其职”,而将“女有归”解释为“君上有道,不为失时,故有归也。”特别又从反面论证,有意无意地丑化妇女说:“若失时者,则《诗》卫女淫奔,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是也。”“男有分,女有归”,实际是指男女都有自己婚嫁的权力与机会,不至因战乱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成为旷夫怨女,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

5. 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在这里,人们有高度的责任心,对社会财富十分珍惜,憎恶一切浪费现象,也反对任何自私自利的行为。《礼记》“大同篇”：“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货弃于地是可耻的，货藏于己同样是可耻的。

6. 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在这里,劳动已经成了人们高度自觉而又十分习惯的活动。《礼记》“大同篇”：“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能劳不劳是可耻的，劳而不尽其力也是可耻的，劳动只为了自己同样是可耻的。正是人们这种不计报酬、高度自觉的劳动态度支撑了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而大同世界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切实可靠的社会保障又是这种劳动态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和谐优越的生存条件，人们回报社会以高度的自觉劳动，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而又互相进。而世外桃源是陶渊明笔下的一个小村落，无争无息，和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大同社会有很大的区别。

但需要注意的是，大同社会毕竟只是一种人们理想中的社会，想要达到大同社会的要求最起码要达到以上的几点。可以说大同社会是一个要求所有人的心都必须是无比纯洁的社会，又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社

会体制,只要人们心中出现阴暗的一面社会就会出现裂痕,即使她给我们带来了那么美好的生活,她还是将面临我们人性的威胁。我们不可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们不会读心术,我们也不能控制每个人,我们只能约束好自己,才能维护好这个社会,这个世界。

墨子“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以及“天人合一”论无一不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文化认同。诸多显现于古代先哲们政治主张、思想中的和谐精神,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树立了精神认同和价值取向。

二、为重塑社会主义和谐道德观提供了借鉴

在传统文化中,和谐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伦理美德。儒家倡导“和为贵”、“和而不同”、“仁者爱人”的伦理道德,主张人民宽和处世,做到“仁、义、礼”,这是传统和谐道德的基本表述。今天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体系,重塑社会和谐道德观,就是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原则的道德准则,倡导义与利的辩证统一、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个人、集体二者和谐统一的“群和”道德状态。传统和谐文化强调“群和”,主张通过治国实现“群和”,“群和”即群体和谐,其中一个重要解释是:“指人生活在群体中,要树立群体意识,人对群体应有责任感、义务观念和奉献精神。”这与我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要求不谋而合,为人民服务,就要求个人对人民群众要有责任感、奉献精神,为人民谋利益。

义利统一是人际和谐的基础,是和谐道德的基本准则。传统和谐文化主张义与利的统一,把利作为义的统一体来对待,正确处理义利关系,也由此引发了义利之辩。儒家在论及义利关系时主张“见利思义”,提倡君子“义以为上”,在利益和道义两者相冲突而不可兼得时可以“舍生取义”,这对于我们塑造集体主义和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提供了借鉴和思考。坚持集体主义,要求坚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在充分尊重和维护个人正当利益基础上,主张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通过维护集体利益和尊重个人利益这种义与利的合理取舍,达到集

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反观当前我们的社会,在市场经济的驱使下,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倾向,从而导致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一些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逐渐淹没了自己,出现了急功近利、损公肥私、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的不良道德现象。这种道德滑坡弊病的诊治,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社会的道德教育,而挖掘传统和谐思想道德资源,对于重树集体主义的社会道德风尚无疑是一副良剂。胡锦涛总书记在“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中提到“以见利忘义为耻”,将义与利的合理取舍提升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高度来审视,这必将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发挥重要的价值引导作用。

三、有利于构建诚信友爱的新型和谐人际关系

《周礼·地官》调人之官的职务是调解民众之间的大小纠纷。《调人》条经文规定:“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和谐之。”东汉郑玄注:“调犹和合也。”又说:“难,相与为仇讎;谐犹调也。”其意是化解矛盾。这里“和谐”类似动词的用法。《调人》条经文还列举了调解的界限:“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古人早就知道通过化解仇恨和矛盾,以求社会和谐。

东汉末年,任曹操尚书郎的仲长统(180—220)写了一本《昌言》,仲长统在其中的《法诫》篇发表议论,主张实行西汉隆盛之世的一卿制,就是皇帝之下由一个大臣主持大政。其中说:“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这话是为曹操专权制造舆论。不过他说的“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是合乎历史规律的。“政专”,就是号令专一,政策一贯、一致等等,这是社会和谐的前提,而和谐是社会安定的根基。西汉盛世是历代称许并且向往的,所以宋代欧阳修《桐花》诗里说:“常闻汉道隆,上下相和谐。”作者把“汉道隆”归结为“上下和谐”,是十分精辟的历史经验。

今天,和谐思想已深入人心,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社会各界人士讨论的话题。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社会,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社会公平正义,社会才会和谐。

社会的和谐,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和谐,所以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核心标志。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总目标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而这也是和谐社会新型人际关系的要义。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的关键词,“诚信友爱”,一要讲信义,二要讲宽和,人与人之间真诚互信、宽和包容,才能做到诚信友爱,才能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要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还应注重社会公平的分配。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孟子在《滕文公上》中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如果没有财产利益的合理分配,人民没有恒产,则会不讲诚信,没有诚信则会“放辟邪侈”,破坏社会秩序。因而和谐社会的构建要特别注意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在我国现阶段,阶层之间、地区之间贫富差距较大,这势必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和谐。所以要正确对待人们对利益的正当诉求,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利益表达的畅通,如此,则上下相安,形成诚信友爱的和谐人际关系环境。

四、为我国实行“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提供了思想源泉,对实现国际关系的多元化和民主化提供了新思路

传统和谐文化极为重视“和为贵”的理念,也倡导“和而不同”,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积极发展同各个国家的友好关系。《周易·干卦》中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阳气为万物之始,故曰“首出庶物”;立君而天下皆宁,所以叫“万国咸宁”。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和睦相处。这些朴素的爱和平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家政治和外交,也深深影响了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甚至是国家治理和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实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把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这是对传统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当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逐渐上升,我们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性体现,也是传统和谐文化的精华思想给了我们新的思路。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崛起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法国

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演讲时所说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利益需要的必然选择，是长期的、坚定不移的”，和谐文化的传统演绎了我们“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

传统和谐文化蕴涵着“宽厚、包容”的思想，主张用“和”来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所谓“协和万邦”，这对于实现当今国际关系多元化和民主化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是“和谐”文化政策的结果，这种“和为贵”的理念是可以推广到国际关系中来。当今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和文明模式多样化趋势日益显现，各种文明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利害冲突，不是像亨廷顿所认为的，未来社会将是东亚儒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冲突。相反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与合作。国家之间不仅仅是竞争，而更多的是合作，如恐怖主义、环境保护、贫困问题等都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需要通过合作来解决。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这是对和平与发展主题的严重威胁，也不利于国际关系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实现。现代国家关系民主化、多元化的内容为：国家平等原则；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提倡发展模式多样化；互利合作、共同发展。这就要求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平共处，共谋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将国际关系推向民主化进程。人类文明多样性，这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世界各国应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互相尊重，共同发展。实现国际关系的多元化、民主化任重而道远，这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演讲时所说的：“就需要提倡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与人为善、以邻为伴。”

五、对于我们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朝宋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诗》有：“临津不得济，伫楫阻风波；萧条洲渚际，气色少谐和。”大风阻行，不得渡济，自然景象也让人没有和谐的感觉。

唐代诗人孟郊《招文士作》云：“好鸟无杂栖，华堂有嘉携；琴樽互倾美，歌赋相和谐。”融洽愉悦的环境，乃有识之文士慕求之所。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内在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荀子·天论》：“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深刻地论述了尊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重要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当今社会越来越表现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西方工业化所走过的道路已证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思路是不可取的。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保护环境对于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家选择了一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我国也作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十一五”规划具体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阶段目标，并专门编制和组织实施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重点专项规划。“天人合一”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内在的契合，而这一传统命题也深化了我们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认识，从而也为生态文明的呼唤奠定了思想基石。新形势下，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论断，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规定，这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解和深化。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我们统筹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三者的关系，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也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终实施指明了方向。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菏泽市委党校）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 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认识与发展

孙明霞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一种理论、一种制度、一种实践,开始人们就赋予它内在的价值目标。而从它价值目标确定的那一天起,在社会主义者们的认识和实践就经历了极其复杂和巨大的变革,从而使社会主义思潮此起彼伏,社会主义运动跌宕起伏。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与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确定与追求紧密相连。60年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共同富裕”、从“人的全面发展”再到“社会和谐”,展示了我党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认识不断成熟与完善,与之相伴随的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为世界所瞩目与赞叹。中国共产党只有深入贯彻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理念,才能切实解决当前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真正实现中国的崛起。

一、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初步认识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以及后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得到了初步的实现。在十月革命以后到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无论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都存在着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本质规定与基本特征混同起来的现象。一方面忽视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规定,使社会主义长期见物不见人,甚至把公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道主义、人性等原

则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加以否定和批判;另一方面又把科学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特征的一些预测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且用这些本质特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则指导实践。甚至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宁要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不要市场经济的高效率”等口号。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反修”、“防修”,目的是为了更快地建成“纯粹”的社会主义。结果造成十年动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遭到极大破坏,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被否定、批判,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几乎中断,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极度贫乏。这一切都是见“原则”不见“人”、偏离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需求,偏离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导致的。我们曾经脱离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和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把这些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和根本价值目标,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持续贫困。它实质上是空想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模式的回归,按照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唯意志论来建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其根本在于放弃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社会主义各国实践中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是,都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社会主义各国长期讳言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丢掉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旗帜,不仅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也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形象,成为国际反动势力攻击社会主义的口实。

二、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深化和发展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得以复归与发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把共同富裕这一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最本质的东西,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使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达到一致;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但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和程度,必须要服从于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把经济制度方面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隐含

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中,从而展示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在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上的科学性。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基本未超出经济领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经济是根本问题和基础,但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当中国总体上已经实现小康社会,在解决人民的温饱以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突出出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问题也凸现出来,需要新的理论进行说明与指导。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准确反映了上个世纪后十年期间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进一步深化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后指出:“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这些论述,已经涵盖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容。它不仅包含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等内容,而且还提出了发展先进文化、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这是对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发展目标的深刻认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及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自然环境恶化等等。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应该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角度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2月19日的讲话中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还明确地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就把社会和谐的理念升华为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重要理念,进一步突出了社会和谐在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中的地位,丰富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价值目标的认识。

这样,我们党在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富裕、公正、自由、平等、公平、诚信、友爱、和谐等确立为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并且提出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深化和拓展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对于进一步破除对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认识以及选择科学合理的发展改革稳定战略都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和谐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重要价值目标。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升华,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实现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认识是逐步成熟与完善的,为我们建设美好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从价值取向上指明了方向,但公正、共富、自由、平等、民主、互助、和谐的价值目标,在现实中远未得到实现。在过去30年里,我国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高速度,可谓天下无敌;但与此同时,生存环境、社会风气、政府信誉、社会诚信、企业责任、公民修养等等,同样以惊人的速度向低劣的方向滑行。可以说,中国在以超高GDP宣告自己崛起的同时,却以超低的道德要求宣告了自己的沉沦。一些重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一次灾难动辄就是几十人、几百人死亡,而且都是相同的事故在重复发生,例如矿井倒塌、煤矿爆炸以及销售假药、食品被污染等。这些事故暴露出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下,金钱至上、拜金主义,渗透了相当多人的灵魂之中,为了发财,一些人不得不择手段,为了个人以及本地区本部门的短期利益不惜牺牲长远利益以及全局利益。在每一次事故的背后都有官商勾结的黑幕,

都有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的行为,都有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生命的现象,都可以看到监管不严、执法不力的漏洞。因此,一部分人的发财致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缺乏公平、缺乏正义的基础之上,是以环境污染以及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高昂代价的。在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果忽视价值目标的建设,不但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念、道德水准、理想信仰的低下,而且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三鹿奶粉事件”、“山西襄汾溃坝事故”等一系列事件的曝光,使世人震惊、心寒的同时,更深深地意识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果忽视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忽视公正、共富、自由、平等、民主、互助、诚信、和谐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建设,人类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三鹿奶粉事件,不但使三鹿集团垮掉,整个制奶行业遭受打击,而且使整个民族的信誉受损。因此,一个国家只有建立在公正、共富、自由、平等、民主、互助、诚信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科学发展,社会才能和谐。要使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得以实现,须做以下工作:

第一,加强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丰富内容的研究。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呈现多元性,并且我国现在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丰富内容,不断拓展其内涵,不断探索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实现的途径,同时要深入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吸收、借鉴国外在价值目标建设上的有益做法。

第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正确的思想舆论导向是建设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基本内容,运用各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手段,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广泛宣传并贯彻到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各方面工作中,使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真正深入人心,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把各方面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把全体人民的积